

# 從波蘭工潮看蘇聯工人問題

謝天士

## 前言

民生物品供應短缺或價格提高，是促使工人訴諸抗議最常見的原因。目前舉世注目的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即起因於波蘭政府的抬高物價。蘇聯政府就不敢隨便抬高物價。但受美國穀物禁運和其他因素之影響，一九八〇年蘇聯肉類產量只有一千五百一十萬噸，比預定目標為少，以致年底蘇聯許多城市的肉類供應不足。據稱，當時高爾基市和陶里亞蒂市曾有罷工事件發生<sup>①</sup>。雖然這種罷工情形並非第一次發生於蘇聯，但始終無法發展成更進一步的全國性大規模的工人運動。如拿生活水準作比較，蘇聯人民的確不及波蘭人民。就食的方面而言，在一九七八年，波蘭人每人消費七十九公斤肉類，而俄國人只消費五十七公斤<sup>②</sup>。就住的情形而言，在一九七〇年，波蘭方面每一百一十三戶可分得一百個住宅，蘇聯方面每一百二十三戶才能分得一百個住宅。若單就城市的情況而言，則波蘭方面每一百一十七戶擠一百個住宅，蘇聯方面每一百二十八戶擠一百個住宅<sup>③</sup>。再從東歐國家人民所得分配較蘇聯更為平均的情形來判斷，蘇聯工人的生活確實比不上波蘭工人。似乎蘇聯工人應比波蘭工人更傾向於進行工人運動，但事實並非如此。可見工運的發生，不單是經濟的因素所造成，亦為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所左右。蘇聯工人是否滿於現狀，因而主觀上不希望從事工運呢？或者雖然有所不滿，但礙於客觀環境因素的限制而無法發展呢？那麼，他們究竟又如何發洩胸中的不滿呢？

## 一、蘇聯工人本身的因素

根據一九六六年蘇聯學者在列寧格勒所作的工人態度調查顯示，工人對工作有相當的不滿<sup>④</sup>。在生活情況方面，社會的繁榮

註①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 1981, p. 14.

註② *Economist*, January 1, 1981, p. 27.

註③ Henry W. Morton, "Housing Problems and Policies of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Winter 1979), pp. 304-5.

註④ Erez Zev Katz, "Soci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20 (May-June 1971), p. 33.

並未使他們受惠，蘇聯社會生活水準越高，他們的「疏離感」越重，他們感到中間階級受惠超過應有的比例。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工人階級對中間階級越來越懷疑，對統治者也越敵視<sup>⑤</sup>。但是蘇聯工人的期望並不高，更談不上對政治權利的要求。他們對蘇聯社會階層分明的結構有著現實的體認，他們容忍既存的不平等。並且，蘇聯工人不是一個堅強團結的團體。例如工業工人便自成一個獨立的團體，他們的社會地位介於農業工人和建設工人這羣人與技術專家和政府官員等另一羣人之間。蘇聯工人本身不僅因居住和工作地點的不同而分化，並且也受到其他標準，包括所得、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技術水準和種族等差異的影響而有別。這種差別和連帶的不平等與他們的共識有相同的比重<sup>⑥</sup>。

此外，蘇聯領導者亦設法將工人分裂成對抗的團體以利控制。例如將礦工分成普通工人和「優秀工人」。前者平均每月收入二百八十塊盧布，後者可高達四百盧布，兩者收入每月可差到一百二十塊盧布，這自然造成這兩種工人間的相互怨恨和為工資相爭。一般說來，具有共黨黨員身份的工人比較能享受一些特權。根據一名礦工所說，頓內茨附近某礦場的三千多位工人中的四百位工人，由於具有黨員身份，便得到較好的設備，較能夠完成上級指定的工作份量，成為「優秀工人」<sup>⑦</sup>，而後享受更好的生活和榮譽。

在另一方面，波蘭工人相信政府對他們所說的：新的波蘭是屬於工人的。在四十年代末，他們的期望很高，這種期望至少能對與他們切身有關的社會和經濟事務發生影響力。所以，自一九五六年波茲南工人舉行示威之後，便對官方的工會表示不信，而成功地組成了他們自己的工人會議，並於當年十一月得到波蘭政府的認定<sup>⑧</sup>。再者，波蘭人在言論上相當獨立並且具有「西方」傾向。他們是歐洲最堅強的天主教徒之一支，許多波蘭人都懷著文化自由和民主的美夢。在政治方面，他們大膽地懷疑蘇聯的政治和經濟學說<sup>⑨</sup>。在這種環境下，大多數兼具共黨黨員和工人身份的波蘭人，認同於工人。

有人認為，反政府的波蘭不滿份子所組成的「社會自衛委員會」(KOR)可謂是團結工會的生身父母，沒有KOR在幕後顧問指導，工會不可能產生、壯大。事實上，一九七六年罷工後，許多波蘭工人被監禁或解雇，他們和家人曾受惠於KOR所募集的二百萬波幣，不滿份子和工人間確實已建立了相當的好感<sup>⑩</sup>。而俄國工人進行抗議時，則總是儘量避免與不滿份子扯上關係。

註⑤ John Bushnell, "The New Soviet Man Turns Pessimist," *Survey*, 24 (Spring 1979), p. 17.

註⑥ Arcadius Kahan and Blair A. Ruble, eds., *Industrial Labor in the U. S. S. R.*,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9), p. 305.

註⑦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0, 1981, p. A18.

註⑧ Jan F. Triska and Paul M. Cocks, e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Praeger, 1977), pp. 125-6.

註⑨ Mervyn Matthews, *Privilege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8), p. 168.

註⑩ George Schöpflin, "Poland: A Society in Crisis, *Conflict Studies*, (October 1979), p. 16.

蘇聯民主運動中的成員，工人只佔約二十分之一<sup>⑭</sup>，這也可以作為反證。

## 二、蘇聯社會環境的因素

俄國工人不敢與不滿份子扯上關係，其實部份原因是由於蘇聯共黨控制嚴密。不管在政治、經濟或文化領域裏，假如沒有黨和政府居中操縱，任何個人或團體的主動精神以及結社行為均不會被容忍。即使是一羣畫家試圖組織一項獨立示威，亦被視為顛覆活動。這不只是可能帶來思想上不良影響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蘇聯政權要摧毀個人或團體主動精神的萌發以及任何個人與個人間的團結形態<sup>⑮</sup>。在這種情況下，與不滿份子無牽連的工人自發性集體抗議行動，亦難以持久。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有七個蘇聯工人曾會晤西方記者，將一封七十二個工人的簽名信公開。這七十二個工人以前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會客廳裏相遇。由於他們不滿所受的待遇，於是決定聯合抗議。由於這些人分別來自四十二個城市，這就構成一項全國性的行動。再者，在蘇聯政權的眼中，與西方記者會晤或透過國際勞工組織向世界輿論申訴，都構成不滿份子的行為。第三，這些人要求有權批評管理，提出抱怨及自由發言等，等於是要求實行憲法權利，與知識份子不滿份子無異。最後，這羣人之中，有些遭到比革職更糟的命運。為首的克列班諾夫（Vladimir Klebanov）於一九六八年時在頓內茨一個礦場當工頭，他拒絕讓手下在危險狀況下工作或非法延長工作時間，後來他被關在精神病院裏<sup>⑯</sup>。蘇聯工人的命運是，除了黨或黨控制的工會之外，找不到任何精神上的領導中心，不像波蘭工人可以從天主教會找到力量，有時候甚至獲得保護。

前面已述及，波蘭人有「西方」傾向和民主的夢想，與這種情形互相影響的另一因素，便是波蘭擴大與西方的接觸。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波蘭私人到國外旅行的情形很少。自一九五六年起，波蘭政府對私人的國外旅行作有限度的開放，結果當年有一萬四千名波蘭人到非共產國家旅行。一九七〇年核准到西方的出境許可達十一萬四千件，到其他共產國家的有五十七萬五千件。旅居波蘭境外的波蘭人高達九百萬人之多，絕大多數波蘭公民到西方的訪問，便是有助於這些旅居國外的親戚和朋友。同時，湧進波蘭的外國觀光客，包括旅居國外的波蘭人在內，其人數也從一九五五年的七萬六千五百人增加到一九七〇年的二百萬人左右<sup>⑰</sup>。

註⑭ 引自 Paul Cocks, et al, eds., *The Dynamics of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34.

註⑮ Viktor Zaslavsky, "The Regime and the Working Class," *Telos*, (Winter 1979/1980), p. 5.

註⑯ 引自同註⑮，頁三五五。

註⑰ 引自同註⑮，頁一七三—一七四。

。而蘇聯公民到西方訪問的，大都是團體行動，以利控制，其人數到七十年代中期也不過是每年數千人。根據美國官方的估計，在一九七〇年有五萬美國人到蘇聯觀光，而只有二百六十個蘇聯人到美國<sup>19</sup>。況且，有機會到西方訪問的蘇聯人，大都是社會中的「優異份子」(elite)，到西方訪問是他們的特權中的一部份。

### 三、蘇聯工人如何發洩不滿

自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以來，西方陸續接到蘇聯工人罷工的報導。根據英格蘭理定大學(University of Reading)講師普拉夫達(Alex Pravda)的整理，自一九五六至一九七三年間蘇聯工人共有六十一一次抗議行動，其中包括五十八次罷工和十二次街頭示威(見表)<sup>20</sup>。總共有多少工人捲入這些行動，不得而知，但是鑑於罷工和街頭示威等畢竟是挺而走險的行為，容易遭到軍警鎮壓，因此想必只有極少數非常不滿的蘇聯工人走上這條途徑。工人對抗管理部門最廣泛而且有效的方式，便是怠工降低生產。除此之外，有許多蘇聯工人，尤其是低度技術工人，則用酒精來解除其不滿。根據「時代雜誌」的報導，一九七六年時，十五歲以上的俄國人平均每人每年喝掉八點五夸特的酒類，相等於美國人或法國人的兩倍，是世界上海類消費最多的民族<sup>21</sup>。而且，蘇聯公民比西方人更傾向於飲烈酒。法國人所喝的烈酒只佔酒類消費中的百分之四，其餘百分之九十六主要是葡萄酒。在蘇聯，則烈酒(亦即伏特加)大約佔酒類總消費的三分之二。俄國人不像西方人，他們不喜歡喝調過的酒，而是喝百分之百的伏特加，一喝便喝到醉<sup>22</sup>。

1956-1973 工人罷工、示威和暴動次數表

(按涉及的問題分類)

問題	1956-59	1960-64	1965-68	1969-73
工作份量和報酬變更	3	4	1	5
報酬不足			1	2
管理行為	1	1		1
食品價格與供應		10 <sup>b</sup>	1(暴動)	3 <sup>a</sup>
房屋和居住狀況	2 <sup>a</sup>	4 <sup>c</sup>		2
民兵或警察行為			2(暴動)	1(暴動)
原因不明	1	9		7

a 包括一次罷工，後來演變成示威和暴動。

b 這是最低估計，並且包括至少三次由罷工變成示威和暴動的事件。

c 包括三次罷工，後來演變成示威和暴動。

來源：同註<sup>20</sup>

註<sup>19</sup> *Ibid.*, p. 176.

註<sup>20</sup> 同註<sup>19</sup>，頁三四八一—九。

註<sup>21</sup> *Time*, March 8, 1976, p. 27.

註<sup>22</sup> David E. Powell, "Alcoholism in the U. S. S. R.," *Survey*, 17 (Winter 1971), p. 129.

蘇聯官方雖然對酗酒時有批評，但並未限制酒類的銷售量，因為它佔國家歲入的百分之十二<sup>19</sup>。甚至有人認為，鼓勵喝酒是一項大多數蘇聯人民尚未察覺的特殊國家政策。的確，酒醉之後降低了部份蘇聯人民（例如男性低度技術工人和農民）的精神需求和一般需求的程度，因而給予他們某種程度的滿足。要降低酗酒的情形，不僅應從降低酒的銷售量著手，更應從根本因素著手，換言之，必須在蘇聯社會中做一些調整，例如改善居住條件、增加消費品的供應、普及正當的娛樂設施等，同時還要給予公民表現主動和創造精神的機會並毅然實行民主化。蘇聯政府既未降低酒的銷售量，又不願從根本原因著手，則酗酒便成爲維持現狀的重要支柱了<sup>20</sup>。

假如酗酒只降低人民的需求，而不會造成其他不良後果的話，則這對蘇聯政權尚不失爲一條妙計，但問題是酗酒是造成工人曠工的主要原因。一九七六年一項蘇聯統計顯示，在總數八千四百萬工業勞動力中，每天就有一百萬人左右未曾上班，所造成的生產損失是可觀的。蘇聯「幽默」雜誌 Krokodil 曾刊登了一幅漫畫——一個疑惑的官員問一個工廠經理：「你們工廠是怎麼完成計劃的呢？」答：「酒店關門整修了」<sup>21</sup>。至於酗酒與謀殺案、交通事故和離婚事件等的關係，則又是些嚴重的社會問題。

另外一項嚴重性不及酗酒廣泛的工人反應，是改變工作。志願辭職是蘇聯工人的基本權利，事實上這是蘇聯式的中央計劃經濟的主要特色。自從赫魯曉夫放棄史達林的「恐怖」統治措施之後，一九四〇至一九五六年間所實行的史達林式的「強迫勞工制度」便不再可行。蘇聯政府必須給予工人志願辭職的權利，否則，取消這種權利等於是驅使工人走向決然的抗議，所帶來的衝擊反而更大。強迫勞工制度取消一年之後，大約有半數工人變更工作，蘇聯的勞工異動現象也開始出現。蘇聯的統計將志願辭職或因違規被當局免職的工人數目視爲勞工異動。自一九五九年以來，每年勞工異動的比率介於百分之十九至二十二之間<sup>22</sup>。其中被免職的人必定佔少數，因爲他們除了喪失年資之外，免職紀錄將被登記於勞工表現的冊子上，永遠跟著他的新工作走，這種懲罰是相當重的。志願辭職的工人，日子也不好過，因爲蘇聯政府對無業的人不僅不給予生活津貼，而且還訂有反「社會寄生蟲」的法律，規定連續超過三個月不工作即是犯法，對初犯者可處以一年勞改徒刑<sup>23</sup>。由上述措施看來，蘇聯每年勞工異動的比率確實很高，顯示不少工人藉志願辭職與管理部門周旋。通常由辭職到就任新工作約相隔二十八天，有的間隔時間更長。這種情形就等於每年損失五十萬個工人。對缺乏勞工的蘇聯而言，這種損失是够大的了<sup>24</sup>。

註<sup>19</sup> 同註<sup>17</sup>。

註<sup>20</sup> 同註<sup>19</sup>，頁二一三。

註<sup>21</sup> 同註<sup>17</sup>。

註<sup>22</sup> 同註<sup>12</sup>，頁六一八。

註<sup>23</sup> 同註<sup>7</sup>。

註<sup>24</sup> 引自同註<sup>6</sup>，頁三三四。

儘管工人有權志願辭職，也可以飲酒買醉，但大部份技術工人都不願出此下策。雖然蘇聯中央還不准許一些工廠的管理人員對志願離職的工人採取嚴厲的措施，例如將所有權屬於企業而由工人所住的公寓收回；但是，根據一九七四年的一項規定，任何志願辭職的工人均將喪失耕耘工廠給他的菜園的權利，這對家庭經濟是一種損失。而且，由於技術工人通常高度專業化，改變工作至少將導致他們的薪水和資歷暫時下降。此外，技術工人的文化水準較高，對各方面的需求也較高，以致他們比較不願意從酒精中尋求滿足或麻醉。因此，技術工人除了怠工之外，最難找到發洩不滿的方式<sup>⑤</sup>。從以上所述，我們不難明白何以蘇聯工業生產率一直低落不振。

#### 四、結 論

蘇聯工人由於生活的環境不同於波蘭工人，因此對參與管理的期望不像波蘭工人那麼高，但對於改善生活的期望應當不亞於波蘭工人。只是礙於環境的限制，蘇聯工人極不可能像波蘭工人那樣成立獨立的工會，唯有藉怠工、酗酒和改變工作等方式來與管理部門對抗，造成生產方面的莫大損失。所以表面上看起來，蘇聯境內平靜無事，但蘊藏於蘇聯社會的弊端，其嚴重性同樣不可忽視。在求得共產政權的穩定和工人生活的合理化之間，蘇共領導人的抉擇當然是以前者為先，也就是容忍生產事業的弊端持續下去。蘇共對內最重要的是嚴密監視不滿份子的民主運動，尤其是要使廣大的工人階級與這種民主運動隔絕。